

现存南海更路簿抄本系统考证

林颢宇

提 要：随着田野调查与研究不断深入，目前已知的南海更路簿与更路图总数有40份左右。然而，学界关注点大多集中于文本内容、性质与意义，却几乎从未从历史文献学角度进行系统研究。梳理现存更路簿文献的状况，分析田野材料、对比各抄本篇章结构与航路记载，对更路簿相关文献的源流与抄本传承关系进行重构，对更路簿的概念进行讨论。

关键词：更路簿 海南 南海诸岛 田野调查

海南渔民在长期前往南海进行捕捞生产活动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一系列文献。其中口传者为“更路传”，手抄者为“更路簿”，手绘者为“更路图”。航海针经书更路簿记载了西沙（俗称“东海”）、东沙及南沙（俗称“北海”）等地岛屿名称、水文状况与航行路线。学界研究多集中于更路簿文本内容、性质与意义，对各本间的传承流变与源流系统则少有研究。综合文献，目前已知抄本凡34份。

一 早期文献汇编所收更路簿抄本

广东省博物馆于1974年冬组织人员前往海南琼海县潭门公社及文昌县铺前、龙楼等公社进行文物调查，征集到一批更路簿与一份更路图。1977年7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韩振华带队于海南琼海、文昌一带进行调查，并将新发现3份更路簿连同此前发现的苏德柳抄本及更路图一起刊登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以下简称《史料汇编》），并于1988年出版。此前一年，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撰的《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以下简称《地名资料汇编》）参考南洋研究所成果，所收更路簿已经达10份之多。

（一）广东省博物馆1974年文物征集获得

其一，苏德柳抄藏更路簿。苏德柳为谭门上教村人，此本系1921年其13岁时抄写，书影初见于《西沙文物》书前图版，现藏广东省博物馆。^①据《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书用棉纸抄写，长22、宽14厘米，对折双面，共四十七页八千余字。”^②抄本分8篇：第1篇立东海更路；第2篇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第3篇驶船更路定例；第4篇原无标题，整理者据内容补作“大潭往广东沿岸、海南岛沿岸、西沙群岛、中南半岛、南洋群岛更路”，并将内容分为12段^③；第5篇无标题；第6篇自新洲去西寺更数；第7篇自星洲去吧里更路；第8篇无标题。此本全文《史料汇编》《地名资料汇编》及《南海天书》有收。琼海作家卢传福与苏德柳之孙苏标武曾合撰《解释祖父苏德柳更路簿》阐释此抄本。此外，卢传福另搜集整理有《南海更路经》。

其二，卢鸿（洪）兰^④抄《自东海过北海更路》。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卢鸿（洪）兰为上教

① 参见广东省博物馆编：《西沙文物》，文物出版社，1974年，图版拾陆、拾柒。

②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4年第10期。

③ 参见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④ 《南海天书》指出：“笔者在上教村做田野调查时，村民们说，卢鸿兰的‘鸿’字应该写作‘洪’。”参见周伟民、唐玲玲编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昆仑出版社，2015年，第742页。

村人，此本约为其20世纪20年代手抄。^①抄本分两篇，第一“自大潭门去东海更路”，第二“自东海过北海更路”。《地名资料汇编》《南海天书》有收。

其三，蒙全洲藏《去西、南沙水路簿》。现藏广东省博物馆。蒙全洲时为文昌县铺前公社七峰大队渔业队顾问，此本系其曾祖父蒙宾文所传。^②抄本不分篇，篇首有“东北风”小标题。《地名资料汇编》《南海天书》所收为蒙全洲口述、麦穗整理之本，系蒙全洲将抄本捐出后凭记忆复述，现藏广东省国土厅。

其四，李魁茂抄更路簿。现藏广东省博物馆。李魁茂为潭门草塘村人，此本为其父早年留下。^③抄本不分篇，题为“东海更路”，《南海天书》有收。

其五，彭正楷抄更路簿。原藏海南行政区水产局，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彭正楷为潭门南截坡村人，此本约为其20世纪20年代手抄。^④抄本分2篇，第1篇无标题，为东海更路；第2篇北海更路。《南海天书》有收，系周伟民、唐玲玲“2010年在潭门镇做田野调查时，在镇渔民协会会长麦邦奋家获得”^⑤。此外，彭正楷之子彭业坚还保存有其父20世纪70年代所抄孤本^⑥，内容不详。

其六，何纪生整理《苏德柳、卢鸿（洪）兰、李魁茂、彭正楷〈水路簿〉综述》。系综合苏、卢、李、彭本抄成，藏广东省博物馆。《地名资料汇编》《南海天书》有收。

（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77年获得

其一，许洪福抄更路簿。许洪福为草塘村人，抄本于1975年11月12日由其子许开创捐给海南行政区水产研究所。《史料汇编》《地名资料汇编》及《南海天书》有收。据《史料汇编》，其簿“用棉纸毛笔抄写的，长19公分、阔10公分，对折双面，共十四页，约四千多字”^⑦。抄本分2篇，第1篇北海更路注明；第2篇上东沙头更路注明。抄本开篇还有看天作恶风篇，有海上恶风谚语12条。

其二，郁玉清抄藏《定罗经针位》。郁玉清为潭门人。抄本分6篇，《史料汇编》编者认为“重点是后面两篇”^⑧，故只收录第5篇东海更路具例、第6篇北海更路具例，另见《地名资料汇编》《南海天书》。

其三，陈永芹抄藏《西、南沙更簿》。陈永芹时为文昌县东郊公社良山大队渔业大队长。抄本分2篇：第1篇去西沙群岛，第2篇往南沙群岛更路。《南海天书》有收。

（三）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1981年征集

其一，林鸿锦抄更路簿。现藏广东省国土厅。林鸿锦为琼海长坡镇青葛村人。抄本分3篇：第1篇流水簿，载正月至十二月流水；第2篇往东海更度；第3篇由东海去北海更路。《地名资料汇编》（据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1981年12月《更路簿》油印本，下同）、《南海天书》有收。

① 参见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第124页。

② 参见韩振华主编，林金枝、吴凤斌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68页。

③ 参见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第124页。

④ 参见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第124页。

⑤ 周伟民、唐玲玲编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第611、641页。“琼海潭门镇渔民协会前会长麦邦奋先生所藏是据广东省博物馆本抄录，并有所增益。”王晓鹏：《南海针经书〈更路簿〉彭正楷本内容初探》，《齐鲁学刊》2015年第6期。

⑥ 参见沈志成主编：《海南文化遗存》，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下卷，第705页。

⑦ 韩振华主编，林金枝、吴凤斌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381页。

⑧ 韩振华主编，林金枝、吴凤斌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390页。

此外，林鸿锦还绘有《西沙南沙岛礁方位》更路图。^①

其二，王国昌抄《顺风得利》。王国昌为潭门南截坡村人。抄本分3篇：第1篇东海更路，第2篇北海更路，第3篇琼州铺前流水簿。《地名资料汇编》《南海天书》有收。此外，其还藏有清代《顺风得利图释》及《南海更路传》。^②

其三，麦兴铤藏《注明东、北海更路簿》。麦兴铤为潭门镇石宛村人。抄本分5篇：第1篇无标题，为北海更路；第2篇上东沙更路注明；第3篇自大潭门去大州更路；第4篇自大潭门去东海更路；第5篇海口流水簿。《地名资料汇编》《南海天书》有收。

其四，李根深藏《东海、北海更流簿》。李根深为潭门镇孟仔园村人。抄本分4篇：第1篇自东海过北海更路，第2篇上东头沙更路注明，第3篇自潭门去东海更路，第4篇广州更路。《地名资料汇编》《南海天书》有收。

二 近年田野调查新发现更路簿抄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次田野调查又陆续发现许多新抄本。周伟民、唐玲玲合编《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共收更路簿、更路图凡28份。新发现更路簿有以下几批：

（一）文昌市文化局2006年征集

其一，王诗桃抄《南海更路经》。王诗桃为潭门镇孟仔园村人。抄本分3篇：第1篇东海更路部，第2篇立北海更路簿，第3篇琼州行船更路志录。《南海天书》有收。

其二，郑庆能藏《广东下琼州更路志录》。郑庆能为文昌市东郊镇口牙村人。抄本不分篇，18条，《南海天书》有收。

其三，郑庆能藏《琼岛港口出入须知》。抄本分2篇：第1篇无标题；第2篇海口流水，急水门流水簿。《南海天书》有收。

其四，郑庆能藏《琼州行船更路志录》。抄本不分篇，无标题，《南海天书》有收。

（二）周伟民、唐玲玲2011年后田野调查发现

其一，苏承芬抄更路簿。苏承芬为草塘村人。抄本分5篇：第1篇立东海更路簿，第2篇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第3篇驶船更路定例，第4篇自新洲去西寺更度，第5篇自星洲去吧里更路。《南海天书》有收。

其二，苏承芬修正本更路簿。抄本分3篇：第1篇无标题，末有“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立”字样^③；第2篇无标题，为西沙中建、永兴岛附近更路；第3篇双帆仔水路。《南海天书》有收。

其三，苏承芬撰《中沙水路簿》。抄本1篇；又附《东沙水路簿》，标题下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的大潭，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④。《南海天书》有收。

其四，冯泽明藏更路经。冯泽明为青葛村委会麻坡村人，此本为其父所传。抄本分2篇：第1篇无标题，第2篇由东海去北海更路。《南海天书》有收。

其五，陈泽明抄藏更路簿。陈泽明为麻坡村人。抄本分4篇：第1篇无标题，第2篇由东海去北海更路，第3篇为流水簿，第4篇无标题。蓝色圆珠笔抄写，《南海天书》有收。

① 参见沈志成主编：《海南文化遗存》，下卷，第705页。

② 参见沈志成主编：《海南文化遗存》，下卷，第705页。

③ 参见周伟民、唐玲玲编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第327页。

④ 周伟民、唐玲玲编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第344页。

其六，黄家礼藏《驶船更流簿》。黄家礼为上教村人，此本约抄于清道光年间，系其曾祖父黄元德所传。抄本分2篇：第1篇无标题，第2篇驶北海更流簿。《南海天书》有收。

其七，卢家炳藏更路簿。海南大学征集发现。卢业发为上教村人，此本约抄于清道光年间，“传承系统为：高祖父卢有谊→曾祖父卢修福→祖父卢鸿保→父亲卢业法→卢家炳”^①，故研究者亦称此本为“卢业法（发）本”。抄本分3篇：第1篇此处是北海，第2篇下尤有东海，第3篇下尤有星洲下洋。《南海天书》有收。

其八，柯家裕抄更路簿。内容不详。

其九，符树万抄更路簿。内容不详。刘南威《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曾提到“蒙（全洲）本、柯（家裕）本、符（树万）本，见麦穗、郭振乾整理的《更路簿》”^②。周伟民多方寻找未得，将刘南威书《〈更路簿〉〈调查报告〉、符宏光〈航海图〉中琼人俗名》表中与柯本、符本相关部分收入《南海天书》。^③

（三）夏代云等2015年后田野调查发现

夏代云、牟琦、何宇阳《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时代考证和文化特征》一文提到，“2015年7月至目前，笔者调查海南渔民时又新发现6份《更路簿》”^④：

其一，吴淑茂藏更路簿。吴淑茂为草塘村委会文教村人，此本约为其父吴清泉20世纪30年代初手抄，于2016年6月捐给海南省博物馆。据夏代云描述：

“吴簿”的更路条文全部用毛笔小楷字体抄写，抄写者先把纸张对折，对折后的每页纸为14.4cm×23cm，共12页160条更路，全文没有标点符号；其中西沙群岛更路2页32条、南沙群岛更路8页96条、南洋更路2页32条。^⑤

抄本不分篇，篇首有“东海更路”标题，夏代云又据更路簿体例与吴家媳妇命名，添“北海更路”与“新加坡更路”两个标题。

其二，庄氏《华南航行沿海手册》。庄船长为儋州市海头镇人，此本为1975年抄自其父，包括流水簿、更路簿数篇，不详。

其三，冯氏更路簿。冯船长为儋州市人，不详。

其四，陈川新更路簿。陈川新为文昌人，此本主要为外洋更路，不详。

其五，郑氏藏更路簿2份。郑船长为文昌人，不详。

（四）海南省博物馆藏更路簿抄本

其一，《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现藏海南省博物馆，为博物馆2011年从琼海征集。“该更路簿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琼海市水产局一名干部赴潭门从渔民手中收购的，具体出自何人之手已无从考证。”^⑥据寿佳琦描述：

① 周伟民、唐玲玲编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第708页。

② 刘南威：《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③ 参见周伟民、唐玲玲编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目录，第IV页。

④ 参见夏代云、牟琦、何宇阳：《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时代考证和文化特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5期，2016年9月。

⑤ 参见夏代云：《海南渔民吴淑茂〈更路簿〉研究》，《海洋开发与管理》2016年第9期。

⑥ 朱磊：《〈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西沙更路考释》，《南海学刊》第1卷第3期，2015年9月。

更路簿封面墨书“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全簿为线装抄本册子，现存 16 页（含封面、封底），部分册页残缺。册页采用朱色印刷，双鱼尾（顺），版心白口，空白处印有吉语“一本万利”和“上”“英兴造”。全册以毛笔墨书，字体为行书，繁体竖排。簿身长约 22 厘米，宽 14.2 厘米，重约 330 克。在册页中还夹有一枚二十四等分罗盘图式。该图式以手工绘制在圆形硬纸板上。根据制版、装订、纸张可推断此簿为清末线装抄本，原用途应为账簿。^①

此本分 3 篇：第 1 篇东海更路；第 2 篇又东海更路；第 3 篇北海更路。

其二，琼海博物馆藏民国抄本更路簿。此本系“琼海博物馆花费 5 万元，淘到的一本抄于民国时期的《更路簿》和一张海图”^②。又据《南海安全战略与强化海洋行政管理》一书脚注：

琼海博物馆收藏了一本抄于民国时期的《更路簿》，不但记录了我国通往东南亚、西亚、东北亚以至地中海沿岸国家的线路，还有一年 12 个月海上流水特征的记载，也不乏风向、暗礁的准确描述，对于那些危险地段还特别标注了航行速度以示提醒。^③

又据《海南日报》报道：“原琼海博物馆馆长陈贻爱收藏了一本抄于民国时期的《更路簿》。”或即此本^④，未详。

三 重构更路簿抄本系统

关于更路簿起源，或说在元代，渔民符再德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前往南海捕捞，由此逐渐形成更路簿。^⑤或说在明代，“传说《更路簿》是三宝公时传下来的，三宝公即明朝的郑和”^⑥。在文昌地区有“红嘴公”传授更路簿的故事。^⑦又有明中、晚期乃至清初诸说，如《史料汇编》认为：“海南岛渔民的《更路簿》，至迟在十八世纪初期（清初）就已出现，到十九世纪中叶趋于成熟，定型成书，此后世代流传至今。”^⑧由于更路簿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同一抄本各篇可能并非成于一人一时，不能简单作为整体看待。上文所列各本间存在许多差异，只有系统比对，才能弄清抄本源流。

（一）关于更路簿分类分期的早期研究

狭义而言，海南渔民广泛传抄使用更路簿可能始于清代；广义而言，系统实用的航海针经早在明代已然形成。由于更路簿在海南各地均有流传，渔民使用较为普遍。夏代云指出：

琼海的潭门和长坡，文昌的铺前、东郊、清澜、文教、龙楼等地，《更路簿》较多……现发现有线索或现存本的地点有儋州市海头镇、昌江县海尾镇、万宁市和乐镇、陵水县、三

① 寿佳琦：《耕海牧渔南海扬帆——馆藏〈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文物天地》2017年第6期。

② 沈志成主编：《海南文化遗存》，下卷，第705页。

③ 安应民编：《南海安全战略与强化海洋行政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④ 参见陈蔚林：《〈更路簿〉：浮出历史的深海》，《海南日报》2016年5月23日，第16版（又见《海南周刊》第352期B04版）。

⑤ 参见周伟民、唐玲玲编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第124页。

⑥ 韩振华主编，林金枝、吴凤斌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409页。

⑦ 参见韩振华主编，林金枝、吴凤斌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404、412页。

⑧ 韩振华主编，林金枝、吴凤斌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6页。

亚市及临高县沿海港口。^①

许多更路簿同时载有不同地区始发的更路，交流与融合使文本趋同，这一过程在陆地和海洋上都可能发生。学者最早曾对苏德柳本进行研究，并由此认为琼海、文昌两地更路簿文本存在交流借鉴关系。据“苏德柳说，这个本子是父亲当年从文昌渔民的抄本转抄来的。……第一篇和第四篇都讲到渔船从潭门港出发，无疑这个抄本根据的是一位潭门港渔民的稿本”^②。《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何纪生按语提到，苏德柳本“底本由其父向文昌县清澜港某渔民借得”^③。韩振华曾推测其成书时间及流传路径：

这个抄本，先在潭门港流行转抄，传入文昌。然后由文昌再传入潭门港的……估计清代的中晚期可以作为该书形成的时间下限。苏氏的《更路簿》抄本的第四篇、第六篇和第七篇的文中，多次记述“灯”的问题，提到新加坡和印尼旧港外的三处灯塔，看来记述的“灯”应是指航标灯……向达校注的《两种海道针经》一书中的《指南正法》部分，也在许多场合讲到旧港和马六甲海峡，但未见有灯（塔）的记载，这或许当时还没有灯塔的设置。而《指南正法》成书的时间，据向达的考证是在清康熙末年（即十八世纪初期），因此，它可以作为苏氏《更路簿》抄本成书的时间上限。^④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甲种《顺风相送》、乙种《指南正法》均为明代抄本。^⑤田汝康认为，《顺风相送》是明嘉靖十六年（1537）所刻《渡海方程》的传抄本。《南海天书》将《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与张燮《东西洋考》、苏德柳更路簿相比较，认为《两种海道针经》和更路簿关系密切。^⑥

此外，曾昭璇、曾宪珊曾对王国昌抄本进行研究，并在文献梳理中按航路记载将更路簿发展分为3期：^⑦

阶段	时代	特点	代表抄本
前期	明代至清前期	以航海更路为主，加上西、南沙渔业更路组成，记载南沙岛礁较少	苏德柳本
中期	嘉庆道光年间	航海与渔业更路并记，西沙、南沙东头、西头、南头作业线已具规模，下洋航路减少，更路开始集中于中部五大环礁区	郁玉清本

① 夏代云、牟琦、何宇阳：《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时代考证和文化特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5期。

②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4年第10期。

③ 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第124页。

④ 韩振华主编，林金枝、吴凤斌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367—368页。

⑤ 参见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1961年。

⑥ 参见周伟民、唐玲玲编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第117—121页。

⑦ 下表内容总结自曾昭璇、曾宪珊：《清〈顺风得利〉（王国昌抄本）更路簿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

(续表)

阶段	时代	特点	代表抄本
后期	清末民国	“东头沙”记载出现,大陆来南海诸岛、西沙下南沙更路增多。五大环礁间更路增多,称中部环礁区为“中线”,将南沙分为四个作业区	麦兴铄本、李根深本、许洪福本、彭正楷本

学界对更路簿的分期研究大致沿此思路展开,阎根齐按流传范围分三期:明代至清前期为较早时期,有苏德柳本;嘉庆至光绪间为流传时期,有蒙全洲、王国昌、李魁茂、黄家礼、卢业发、郁玉清、彭正楷、卢洪兰、吴淑茂、陈泽明、林鸿锦、陈永芹、许洪福本,及《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清末至民国为盛传时期,有麦兴铄、苏承芬、王诗桃等本。^①李彩霞按航路记载分两期:乾隆至道光年间为航海更路簿,如黄家礼、蒙全洲、苏德柳、郑庆能、郁玉清、陈永芹及苏承芬祖传本;清末民国间为渔业更路簿,如王国昌、李根深、许洪福、卢洪兰、彭正楷、吴淑茂、卢家炳本。^②从渔业发展与航路开辟角度推断各抄本时代先后,对辨析抄本源流有一定价值。总而言之,年代、地域与传承关系三要素是梳理更路簿抄本源流的关键,具体可从两方面入手:首先,由田野资料得知抄本传承关系。罗盘时代,更路簿是最重要的航海指南,海南老一辈渔民中有许多人年轻时曾传抄并实际运用更路簿前往南海捕捞生产。田野调查记录的渔民口述材料,是确定抄本传承关系的重要依据。其次,由文本内容推测抄本传承关系。若篇章结构、标题与所载更相同相似,则系互相传抄;若抄本存在重复条目、同一岛礁名称有多种记载,则系多本合抄;若抄本曾于某地流传,则更路始发于某地。

(二) 已知更路簿传承线索

其一,苏承芬抄本更路簿系由苏德柳本转抄。二人同村,苏德柳为苏承芬侄辈。苏承芬本将苏德柳本第5篇的6条和第8篇前11条合并抄入“自星洲去吧里更路”。两抄本除个别条目差异,内容基本全同。

其二,苏德柳、卢鸿(洪)兰、李魁茂、彭正楷本均从潭门征集,何纪生曾将4份抄本合并归类整理:其中“西沙群岛”更路107条,69条(64.5%)仅见于某一抄本,25条(23.4%)见于2抄本,12条(11.2%)见于3抄本,1条(0.9%)见于4抄本;“南沙群岛”更路182条(李魁茂本无南沙更路),56条(30.8%)仅见于某一抄本,51条(28%)见于2抄本,75条(41.2%)见于3抄本。^③西沙更路中,苏、卢本相同者17条,苏、李本相同者12条,苏、彭本相同者8条,卢、李本相同者17条,卢、彭本相同者9条,李、彭本相同者4条;南沙更路中,苏、卢本相同者75条,苏、彭本相同者100条,卢、彭本相同者101条。苏本、卢本、李本更路均从潭门始发往七连屿,彭本不载始发地。总体而言,西沙更路记载差异较大,反映了不同时期西沙航路和作业区的变化;南沙更路重合度较高,是因从西沙去南沙航路相对成熟固定。何纪生认为早期征集的“各抄本的内容大体相同”,应是基于所载南沙更路的结论。卢本9条重复二次;彭本有40条重复二次,5条重复三次,

① 参见阎根齐:《论海南渔民〈更路簿〉的分期及其文化特征》,《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② 参见李彩霞:《从航海更路簿向渔业更路簿的演变——兼论南海更路簿的分类与分期》,《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第24卷第1期,2017年2月。

③ 参见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第124—139页。

这说明卢本、彭本都合抄了两三种抄本。此外，郁玉清《定罗经针位》亦属于潭门渔民抄本。

其三，王诗桃抄本更路簿系合抄苏德柳本、彭正楷本，并有参考其他抄本。郑庆杨曾注意到此本“东海更路部”和“立北海更路簿”中两处错误：“王诗桃的《更路簿》，又正好是综合抄录苏德柳和彭正楷等人的《更路簿》。经笔者和王诗桃本人核实，证实确是抄录苏德柳《更路簿》时出错。”^①

王诗桃抄本立北海更路簿中，有14条重复二次，3条重复三次，均系合抄之痕迹。此外，王本东海更路簿末尾还有自大洲（万宁大洲岛）、鸟头（三亚铁炉港）、行笼头（亚龙湾）始发往西沙更路7条，自大洲、陵水始发下洋更路2条。以上9条更路，除大洲往尖（针）笔罗（越南占婆岛）一条苏德柳本有载，其余8条不见于苏、彭本，可知王本有参考其他抄本。

其四，冯泽明藏本更路经系由卢鸿（洪）兰本而来。据《南海天书》编者介绍，“是他父亲以卢鸿兰本为蓝本，稍微作删削而成”^②。

其五，陈永芹抄藏本《西、南沙更簿》系抄自蒙全洲本。《史料汇编》提到：“据调查，陈的抄本是从同县的铺前公社老渔民蒙全洲的《更路簿》抄去的。”^③蒙全洲祖父蒙宾文在清嘉庆年间即到西、南沙捕鱼，蒙本至少为清中晚期抄本，其更路由清澜港出发，可知为文昌渔民撰写。

其六，陈泽明藏本更路簿系抄自林鸿锦本。据《南海天书》介绍：“陈泽明抄本分前后两种。据认真对照，发现前面33页用毛笔抄写，是抄自林鸿锦本；后面自34—40页用蓝色圆珠笔抄写，是据自己驶船经验补充增加的。”^④第34页末有“乙亥岁正月抄”字样，知抄于1935年。林本更路由潭门始发，可知为潭门渔民撰写。

其七，郑庆能藏本《琼州行船更路志录》系王诗桃所抄。据王诗桃自述：“有一本‘更路簿’，但给郑庆能借走了，没还回来。后来他又抄了一本，要留给孩子、孙子。”^⑤比较可知，王本“琼州行船更路志录”篇凡35条，郑藏本《琼州行船更路志录》凡50条，二者篇题相同、内容相似，可知郑藏本实系王诗桃早期所抄。其后王诗桃凭印象所默抄本，内容不如郑藏本完整。

其八，郑庆能藏本《琼岛港口出入须知》系由临高传来。据郑庆能自述：“‘更路簿’是师傅教的，我的师傅是临高人，叫李长福。”^⑥故此本对临高一带更路记载尤为详细，亦记录由海口港、铺前港、洋浦等地始发更路。此外，郑庆能藏《广东下琼州更路志录》载更路18条，应源自广东沿海地区。

其九，各本流水簿均载文昌铺前急水门（木栏头）潮汐状况。已知更路簿中只有6份包含“流水”记录，分别为：苏承芬抄《中沙水路簿》、郑庆能藏《琼岛港口出入须知》、林鸿锦抄更路簿、王国昌抄《顺风得利》、麦兴铄藏《注明东、北海更路簿》、陈泽明抄藏更路簿。流水状况与近海捕捞收获量密切相关，而对前往西南沙潜水捕捞影响不大，6份流水簿说明了近海作业对文昌渔业生产的重要性。

其十，王国昌本《顺风得利》与海南省博藏《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同源。曾昭璇、曾宪珊曾对《顺风得利》进行研究，认为此本成于同治以前，并发现其中更路有30余条重复，且有一地两名（“如女青石与染青石并用，恶浪门与恶落门并用等”）现象，说明系合抄诸本而成。^⑦《顺风

① 郑庆杨：《蓝色的记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364页。

② 周伟民、唐玲玲编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第213页。

③ 韩振华主编，林金枝、吴凤斌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367页，另参见第404页。

④ 周伟民、唐玲玲编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第726页。

⑤ 周伟民、唐玲玲编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第231页。

⑥ 周伟民、唐玲玲编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第240页。

⑦ 参见曾昭璇、曾宪珊：《清〈顺风得利〉（王国昌抄本）更路簿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

得利》从潭门出发，又包含铺前流水簿，南沙更路之末又载由大洲（万宁大洲岛）出发的下洋更路，可知王本曾在琼海、文昌等地流传。朱磊研究发现，《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第一部分东海更路42条，记载的部分地名、针位和更数几乎与王国昌本完全相同；第二部分北海更路仅记载169条，除部分针位略有偏差外，基本与王国昌本相同。……第三部分东海更路49条，其中14条与第一部分重复，2条为赴国外更路”^①。王本流水簿为此本所无，可知此本一直在潭门本地流传。

其十一，一批更路簿表明，海南岛北部、南部地区均开辟有南海航线。除王诗桃本外，又如卢家炳藏更路簿，夏代云总结卢本往西沙更路有二：“一者从潭门往东南去七连屿，在宣德群岛作业，然后前往永乐群岛。二者是从潭门往南到大洲、三亚湾一带前往永乐群岛，然后去宣德群岛。”^②然而卢本所载由大洲、高龙头（亚龙湾）、铁芦港始发往干豆（北礁）更路均为独立航线，并非先由潭门南下再驶往西沙。卢本先载南沙更路，后载西沙更路，可能由两种更路簿抄成。又如吴淑茂藏更路簿，不仅记载由潭门始发往干豆更路，还记载由干豆、猫兴（东岛）、三峙（南岛）返航更路。夏代云总结认为，吴本往西沙更路有二：“从潭门到七连屿，从大洲到北礁。”^③吴本末尾又载行笼（亚龙湾）、鸟头及大洲始发往西沙群岛更路6条，以及由大洲始发下洋航线。

其十二，黄家礼藏本《驶船更流簿》系潭门渔民抄本。黄本西沙更路由潭门始发往七连屿，与其他抄本大同小异。夏代云据名称推测：

黄家礼的簿名称为《驶船更流簿》，却并没抄写流水内容。估计原来的抄本有流水内容，故名；后来多次誊写时，照抄书名，却省抄了流水内容。^④

由此可知，此本或曾在文昌一带流传，而流水簿对潭门渔民生产帮助不大，故而被省略。此外，由于更路簿为船长密本，大多不轻易示人，只在家族内部、亲友之间传承，“如卢家炳说他并没有看到过黄家礼家的《更路簿》，他们两家是紧邻”^⑤。

其十三，许洪福更路簿所载为南沙更路，开篇载航海看风经验，为别本所无，惟蒙全洲本开篇有“东北风”字样，与许本体例相似。许本又有专篇载南沙“东头沙”更路，与李根深本相似。

其十四，李根深《东海、北海更流簿》抄本名与黄家礼本相似，可能原附有“流水簿”。首篇、次篇载南沙更路，第3篇载潭门始发往西沙更路，与卢家炳本相似。其后有“广州更路”独立成篇，与郑庆能本相似。

其十五，麦兴铕《注明东、北海更路簿》首篇载南沙更路，次篇载西沙更路，与卢家炳本相似。第3篇为从潭门往大洲下洋更路，第4篇又载潭门始发往西沙更路，第5篇为铺前流水簿，篇章顺序安排表明，麦本可能合抄自四五份抄本。

综上所述，现存更路簿大致涵盖8部分内容：一是潭门渔民所撰，由潭门往西沙更路；二是文昌渔民所撰，由文昌往西沙更路；三是由南部临高、万宁、陵水、三亚等地往西沙更路，未独立成篇；四是由西沙往南沙更路；五是海南岛东部沿海航行更路；六是文昌铺前急水门流水簿；七是广东往文昌、万宁等地更路，数量不多；八是由万宁等地下洋更路。大多数学者认同，宋元

① 朱磊：《〈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西沙更路考释》，《南海学刊》第1卷第3期，2015年9月。

② 夏代云：《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海洋出版社，2016年，第150页。

③ 夏代云：《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第268页。

④ 夏代云：《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第286页。

⑤ 夏代云：《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第157页。

时期是“口传更路簿”时代。由于老一辈渔民多数文化程度不高，上溯至明代，从口头到书写的跨越，正是以早期航海针经文本为桥梁。现存30余份更路簿并非30多种，而是大致由8种不同性质、来源的文本有机结合组成。

余论：对更路簿名称的重新审视

随着研究不断推进与深入，学界对更路簿相关抄本与图绘也有了更多认识，最早接触这批文献的学者将之称为“水路簿”，《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指出：

海南岛渔民航行于西南沙群岛等地所用的海岛针经书——《更路簿》，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编著的《西沙文物》一书中，把他称为《水路簿》。根据海南岛渔民的叫法，一般都叫《更路簿》，同时，各种抄本的《更路簿》，都用《立××更路》之语来立书中的篇名的。譬如陈永芹抄本的《更路簿》，明确用《西、南沙更路》的书名来命名。因此，我们认为叫《更路簿》比叫《水路簿》更为确切些。^①

外交部1980年1月30日发表声明《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提到“历代渔民的《更路簿》等著作，记载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到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生产的情况和这两个群岛的位置及岛礁分布状况”^②，这也是更路簿称谓首次见于官方文件，由此更路簿取代水路簿成为正式名称。而在渔民群体中，称更路簿或水路簿者皆有，但仅作为方便俗称，而非固定名称。郑庆杨写道：

《更路簿》本是一直没有书名的手抄本。当年渔民们记录“更路”在本子上，仅是为了航海的实际需要，没有人认为它是一本书，更没有人不在乎它有没有书名。它记在簿子上，而且并不太厚，所以就称其为簿。……而且大家在口头流传中都一直叫它为《更路簿》，也有叫《水路簿》。但考究起来，还是叫《更路簿》更为普遍与准确。^③

30余份《更路簿》，大部分无总名；一部分以首篇名称作为簿名；少数有总名者，皆如“自东海过北更路”“定罗经针位”“西、南沙更路”“顺风得利”之例。由此可知更路簿为泛指概念而非确指书名。所谓更路簿实际包含两部分：更路与流水，分别对应远洋与近海渔业生产。

更路簿是渔民在传抄航海指南基础上，结合自身生产需求摘抄、汇集各种抄本，并不断根据航海经验增删修改形成，是海南渔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由更路簿抄本源流关系足证海南沿海各地渔民自古以来即有去南海捕捞作业的传统，南海是渔民祖祖辈辈耕海牧渔的“祖宗海”。更可进一步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韩振华主编，林金枝、吴凤斌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366页。

② 韩振华主编，林金枝、吴凤斌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460页。

③ 郑庆杨：《蓝色的诱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223—224页。